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73  
15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七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贝宁	布瓦雅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班克哈亚勒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会议的决定，我根据惯例以及《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南斯拉夫、和毛里塔尼亚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七〇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讨论。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哈杜米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和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安理会现在举行一系列会议来处理面前的问题，对本组织来说并不陌生。这个问题已经辩论了二十七年多了，二十七年的中东动乱、冲突和暴力；而近几年来，暴力似乎超越中东地区范围之势。现在进行的这一系列会议的意义在于，这许多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要安理会处理由它自己一九四七年的决定所造成的问题。

巴勒斯坦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大家熟知的，但我将简短地再次说明我们立场的要点。

我们仍然相信，联合国在没有征求该领土人民的意见，违背他们的众所周知的意愿，不顾他们的公开反抗的情况下，决定将巴勒斯坦实行分治，是一件不正义的



就在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祖先的房舍和财产面前，在他们曾经工作的农场和曾种植的果园面前，巴勒斯坦的人民变成了一堆无名无姓、无形无状的人，在难民营中靠国际赏赐讨生活。不错，安理会曾通过决议，要求让愿意回去的难民回归家园，但是那个决议迄今仍是一纸具文而已。直到一九七三年，在十月战争前不久，当时以色列总理果达·梅厄夫人在回答询问时还解释说：“谁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就不存在。”

昨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为她这番话的意思挖空心思作解释；对我来说，读了这段解释以后，似乎并不比未读以前更清楚些。那末，我们又如何解释以色列常驻代表今天不出席的事呢？

不过，世界上其他的人终于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根源——这个承认并不是我们赐给他们，而是，用布托总理的话来说：

“……是英勇的巴勒斯坦儿女用苦难、坚忍和不渝的信念赢得的”。

再也不容怀疑，如果要在该地区的人民间达成和平与持久解决，就必须处理和解决一九四七年的重大决定所造成的问题。以色列生存的基础不能建立在巴勒斯坦的灭亡上。安理会再也不能回避巴勒斯坦的现实，一整个民族流离失所、无国无家，规定这个民族的存在决议，正是在极不寻常的压力和操纵下，以不能说服人的微小差额通过的，其中规定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移民在中东建立祖国的那项决议；可是这些移民到今天还常常需要威逼利诱才肯前往。

我提到这些事，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要采取真正有效的行动，就必须正确地、全面地看待整个局势。我们相信中东事务已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相信，对大家都有利的解决办法是可能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将为该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定，为该地区各国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关系奠定基础。当然，也可能错失良机，情况连续发展的结果，该地区又可能爆发战争，使今天一致明白渴望重获和平与安宁的人民，遭到死亡和毁灭。

只有通过具体的谈判，冲突的有关各方才能探测对方的意向，达成协议，而有人断言，安全理事会已不是这种具体谈判的适当场所。对于安理会无权介入国家间争执的说法，对于安理会没有责任采取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成立安理会的目的，正是要执行这些任务和职权。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安理会应该在这个阶段直接介入媾和的过程。为这个目的而成立的，由美国和苏联担任联合主席的论坛，已经有了，虽然我们得承认，从日内瓦会议成立以来，还不曾按照它成立的原旨加以利用。不过，事物并没有静止不动。美国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的努力已导致缔结了三项协定，这些协定尽管重要，适用的领土和政治范围却都有限。我国总理布托先生最近访问斯里兰卡时曾说：

“西奈部队脱离接触协定缔结以后，没有接着采取其他步骤，消除叙利亚边界和遭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爆炸性，我们对此事表示关切。”

他吁请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立即担负起推动一个全面解决办法的任务。总理宣称：

“中东现在的不战不和的状态是很不稳定的。”他警告说，“时间是对和平不利的，也一定是对以色列不利的。同时，所有的征兆都指出，现在已是时候了，要在以色列撤出所有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基础上找出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也要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愿望。”

我刚才说过，巴基斯坦并不以为安全理事会本身可以从事中东谈判。可是，我们相信，安理会能够而且应该阐明指导谈判过程的主要原则，并使谈判能够迅速而成功地取得结果。我们相信，如果所有有关方面都这样想，安理会就能在

这个阶段朝着有利于谈判过程的方向跨出重要而积极的一步。

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安理会在这次的一连串会议中，应该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自决的权利，恢复他们民族存在和主权的权利，以及回返他们失去的家园和财产或取得赔偿的权利。正如叙利亚代表在前几天提醒我们的，安理会这样做，只不过在要求彻底而忠实地执行它自己现有的有效决定而已。

我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我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完全有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在这里和在一切论坛上发言和进行谈判。它的这项资格已在一九七四年十月的拉巴特首脑会议得到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承认。我们前几天在这里听到约旦代表说，这项决定也得到了约旦的认可，并说约旦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性。对于这一点，我要借此机会向勇敢而有远见的约旦国王的明智、无私和爱国精神表示敬意。伊斯兰国家的拉哈尔首脑会议也承认了巴解组织的资格。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会议也都这样做了。大会在授予巴解组织观察员资格时，也承认了它的代表性。在以色列本国，较有远见的人也已宣称，必须承认巴勒斯坦的实际存在，与它的代表进行接触。在今天的安理会上，被联合国分裂和赶出故乡的巴勒斯坦人民有代表在这里，而由联合国建立的以色列的代表却没有出席，在外面对本组织大肆诽谤诬蔑这真是怪事，或许也是很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以色列曾指控阿拉伯人拒绝进行谈判，今天却非要选择它的谈判对手才肯进行谈判。以色列要选定它的邻居，不然的话，它就拒绝与它的阿拉伯邻居和平相处。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审议自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通过以来的情况发展，并审议在走向决议所宣布的目标的道路上，有了什么进展，什么地方缺乏进展，缺乏进展的原因何在。安理会仍然承诺要执行的第242(1967)号决议差不多通过于九年以前。我们一向认为，这项决议明白规定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间长久解决的要素，尤其重要的，决议要求以色列部队撤出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意义含混的地方，那就是在动机和未曾公布的目的上；在决议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含混不明的地方。不管怎样，安理会绝不能容许故意拖延耽搁，和有计划的不采取行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总是有人不断提到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提到要保证以色列未来的安全和生存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此有两点意见。第一点是这个问题特别有关的，就是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继续不断扩张国界的是以色列，受到损害的是它的邻国。第二点是一般性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筑在别国的不安全的基础上。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要由它国界的地理位置来决定，这种想法不但不能见容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中东的历史也证明它是错误的。布托总理在拉哈尔的回教首脑会议上说过：

“任何国家都不能目中无人地自以为有权决定什么是它的安全国界……一个国家边界的安全要靠它们对国际法的遵守”。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以色列都想用战争和军事优势来求得安全。但是，每一次战争，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使安全与和平受到损害。以色列今天占领的土地比它一九四八年的土地大好几倍，为了保护这些占领土地，每年要化120亿美元维持它的军队。以色列向阿拉伯人要求和平与承认，难道阿拉伯人会把和平、承认和领土一齐送给它吗？如果以色列已决定不归还占领的领土，如果在那些领土上设置移民点就是以色列真正意图的表示，那么以色列已经再度作了决定，把该地区的前途交给战争去解决。悲剧在于——实际上希望也在于——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时间和情况的发展，都是有利于和平的。我们听过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民代

表的发言，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要毁灭以色列、威胁它的安全或敌视犹太民族的主张。

如果以色列真正希望和平，它就应该承认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事实，从此以后，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既不是时间、也不是武力或诋毁所能抹杀的。如果以色列的目的不是要扩张领土，它的领导人就不该再作出给人相反印象的宣言，就不要在被占领领土上制造所谓的事实，不要想改变耶路撒冷的人口和文化特性。如果以色列想获得安全，那么它应该宣布愿意撤出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占领的领土。

巴基斯坦人民和中东的阿拉伯人民有血缘和宗教上的亲密联系。但即使没有这些联系，我们仍然会支持他们的事业，因为那是以自决、尊重联合国原则和决定、反对武力和恐吓等原则为基础的正义事业，巴基斯坦一向珍视这些原则，无论远近都加以支持。可是，我们并不是盲目地、不经思考地支持阿拉伯人，不是象我们看到以色列希望于它的支持者那样，要它们盲目而不经思考地支持它的任何一种幻想、要求和策略。

我们反对以色列，并不是象我们一位同事所以为的那样，反对它的政府制度，尤其不是因为它的人民是犹太人。我们用常识而不是敌意对以色列说：看一看那一个方向才符合这个曾一度有过和平的古老地区的所有人民的真正利益，用缺席的以色列代表的话来说，在这个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共同生活了好几千年，即使在一九一九年，犹太人仍然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友好欢迎。请以色列的领导人想一想，他们是怎样报答这种欢迎的，他们要怎样才能再赢得以前对他们的友好和接受。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我开始就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讨论的项目发言以前，我国代表团愿意参加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关于这一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部长会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的逝世，已经向中国人民和国家表示哀悼，并请向他的遗属转达吊唁之意。

在当前最迫切和及时的国际问题中，很难找到象中东问题那样，从联合国存在以来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审议过那么多次的一个问题来，更确切地说，中东问题就是在该地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之间，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冲突。

今天，联合国和它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以可以理解的忧虑心情，再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种忧虑的心情绝不是偶然的。一个事实可以解释这种心情，那就是中东区域一向，而且现在还继续是，军事紧张和武装冲突危机重重的根源，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持久性根源。

凡是参加目前审议中东局势的人自然都会怀疑，为什么，尽管联合国作出了许多努力，中东危机对世界和平依然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掠夺多年来属于阿拉伯人民的领土的侵略者，还继续占领着这些领土，而且有意加以并吞，漠视联合国各项决定而向国际社会挑战，所以威胁仍然存在。正因为以色列领导人的顽固不化，因为他们继续执行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众所周知的各项决议仍不能得到执行。

有些国家还继续从中作梗，阻挠在中东进行政治解决，这些国家现在慢慢地都露出了它们的真面目，原来它们都是以色列侵略政策的保护者和煽动者。它们企图回避专为谋求政治解决而设立的机构——即日内瓦和平会议。这些侵略者的朋友和保护人企图混淆通往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道路而使之复杂化；它们就各种单独的问题进行个别的交易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将有关中东全面和平解决的各项关键问题置之不理。

现在，空前明显的是，只有祸根得以铲除，有关政治解决的各项关键问题得以

解决，中东紧张局势的危机根源才可以消除。难道今天还有人想要证明，在各别基础上达成的完全是零零碎碎的措施，已经解决了中东的爆炸性局势而在该地区建立了稳定和平的任何基础？实际情况会粉碎任何对中东局势所存的这种幻想。所谓片面措施的办法，不能导致中东问题的持久解决，因为这会将问题的核心，有关政治解决的关键问题，置之不理。政治解决的中心问题应该是，以色列部队必须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退。联合国各项决定所承认和一再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个问题。而且，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应当充分享有合法的民族权利，包括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将确保中东地区所有各国和人民独立生存和自由和平发展的权利得到适当的承认。

以色列和美国的新闻和其他宣传机关一向歪曲事实，散播谣言，说什么只有苏联和阿拉伯国家才提出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全的这些条件。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是事实，这是对实际状况的歪曲。今天代表联合国大多数的所有不结盟国家也都提出这些要求。最近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所作的一项决定也反映了这一点，大家知道，这个会议由八十个以上国家的部长参加。利马会议的政治宣言作了下列的声明：

“会议认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利益在于立即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并重申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必须以下列两个原则为基础：

1. 以色列立即无条件撤离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
2.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所有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国家、自决和政治独立的权利。（A/10217，第54段，英文本第11页）

这就是全世界不结盟国家所表示的立场、意愿，而这些就是它们提出的要求，并不只是苏联才提出这些要求。现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定也提出这些要求，这反映了目前由14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联合意愿。

苏联认为只有对中东和解的各项问题和各方面作出全盘的解决，才能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避免再度发生军事冲突，苏联的这种考虑，是十分有理的。苏

联一向，而且继续主张在这个紧张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而不只是缔结一般的，朝不保夕的停战协定。苏联政府经常表明对达到这个目标的真切关怀，一方面是基于我们爱好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立场所持的原则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即我国在地理上同中东地区为邻。对许多国家来说，中东一旦爆发战争，不过是“隔岸观火”，对我们来说，可不是这样，这把火烧到我们大门口了。

目前安全理事会就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以及各位阿拉伯代表的发言，再次充分地证明，中东局势仍然十分紧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我们应该率直地指出，这种蓄意维持的紧张状态，妨碍了正在进展的国际缓和，以及世界各地已经在进行的各种积极改变的发展，这项进展，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是可能的，那么，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实际的途径是什么呢？苏联代表团本着它的责任感，相信这种和平是可能的，而达成这种和平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中东问题所通过的各项众所周知的决定。从这点看来，建立和平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障碍就是，在二十世纪过去的三分之一世纪之间，以色列悍然和嘲讽地拒绝遵守现代国际法和公认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基本原则。如果以色列不自私自利，利用侵略阿拉伯邻国的成果，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平是可能的。

如果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真诚希望结束这个地区不稳定和爆发性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让阿拉伯各国人民，包括受侵略和遭受侵犯暴行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在内，享有各项合理、合法和主权的权利，并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阿拉伯领土的一部分遗产现在还在用武力掠夺这些土地的丑恶的侵略者手中，以为对这种情况也可自安的任何想法，是与生存的基本道理背道而驰的。

我们苏联人民，从我国对法西斯的侵犯进行神圣的英勇的斗争经验中，懂得了这个道理。阿拉伯人民要求归还他们无可置疑的祖先产业，这是非常应当的，在这方面给他们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是联合国各个会员国当然和应尽的义务，每个会

员国都珍惜它们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完整的权利。

以色列领导人由他们的保护人和恩主的认可，还企图拖延，或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中东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定。他们和支持他们的许多人，对阿拉伯国家，对他们的朋友，甚至对联合国，都放言恫吓，施出讹诈的伎俩，不顾一切地拒绝就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以色列不参加安全理事会这次的讨论是这种不顾一切政策的另一项实证。这就是一个应该将其存在和建国归功于联合国的国家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显而易见的，以色列方面采取这种立场是威胁和平的立场。

消除中东紧张状态的这种根源的迫切需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东冲突的全面解决。苏联认为，在这方面联合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充分健全的国际基础，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都揭示出这种基础。这些决议规定对这个问题作合理的解决，考虑到中东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正因为这个理由，他们才获得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也正因为这个理由，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积极支持联合国的那些决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主张肯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遵守和平、安全和平等的原则，这是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决议所揭示的一些原则。

任何解决中东冲突的方案的基础，是要遵守和严格执行宪章的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关于不许以武力掠夺领土的各项决定；这就是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中，无条件地和完全地撤退。只有执行这项公认的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赫尔辛基再度确定的原则，才能打开一条光明大道，在中东建立牢固持久的和平。

人们不可能一边大谈和平的意愿，一边继续侵占着别人的领土；也不可能一边大谈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一边存心不良地企图确保可以利用从占领领土撤离部队一事来进行形形色色的秘密交易和玩弄政治游戏，向阿拉伯人提出令人不能接受的条件和要求，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应该接受下列切合实际

的结论：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是不能用来作为讨价还价和秘密政治交易的对象的，不论这种交易表面上看来是多么美丽。

苏联一向赞成一种解决的方案，以确保中东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和民族主权，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国际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已经有极其明显的积极改变，大会通过了各项重要的决议，安全理事会也承认在进行中东问题的讨论时，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在安理会应有代表，这些都是这种积极改变的反映。联合国这些决定极其明确地确认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具有不受外界干涉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他们被剥夺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目前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明显地证明了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就是在谈到中东的解决时，没有人应当忘记，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必须是这种解决的组成部分，对联合国来说，巴勒斯坦问题绝不是新的。 联合国通过了许许多多的决议；发表了几百次演说；写了好几吨的文件。 但是，由于以色列领导人的沙文主义的愚蠢和顽固，迷信着完全陈腐的神话和二千年的旧传说，竟使三百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所遭受的惨剧，仍然存在。 以色列统治集团大肆嘲笑《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人权宣言》、国际条约和决定，继续推行其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结果使长期遭受痛苦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沦为难民，被敌人逐出家园。

联合国可不可以袖手旁观这些人民的悲剧和痛苦，毫不关心这些人被逐出家园、为暴力所迫，以致无家可归的情况呢？不；联合国不能够也不应当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因为这种态度和《宪章》内所宣布的崇高原则是不相容的。 对于这些人民的惨剧应当直接负责的某些国家的代表，喜欢在联合国及其他会议上大叫人权。 但是他们却对被外国侵略者逐出家园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故意不闻不问。 也许这些假的人权辩护士最后在安全理事会提出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会在这儿谈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吧。

以色列及其保护人一直设法将联合国巴勒斯坦的问题变成人道方面的简单讨论，即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 但是，以色列完全忽视了所有联合国的无数决定，甚至忽视巴勒斯坦难民中的这一个非常狭窄、个别的人权方面，一贯地拒绝遵守这些规定。 即使“难民”这一个词也包含很多意义。 为什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为难民？因为以色列用暴力把他们逐出家园，夺去他们的家园，使他们成为难民。 这是道德的行为吗？不，这是那些宣扬一个民族较所有其他民族优越的人所作的种族主义犯罪行为。 巴勒斯坦问题不是一个难民问题。 它不全是人道问题。 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与侵略战斗，它能够让种族主义者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暴力非法行为合法化吗？不，不能够，也绝不会如此。 最近

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联合国恢复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通过正面的决定，证明了苏联和许多其他国家立场的正确和适当。 尽管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大部分国家的舆论逐渐相信，在解决中东问题时，巴勒斯坦问题可以并且应当在公正合法的基础上解决。 不然，中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就象现在这样地没有真正的和平。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三十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承认并重申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联合国的决定也载有国际上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法律承认，这个组织在他的无私的英勇斗争中，表现出它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利益和愿望的真正、合法的代表。 这些决定并直接指出，一切关于达成中东和平的努力、讨论和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应当参加。 这是正确而完全公正的。 除非建立中东和平的主要一方，巴勒斯坦人民的意见，受到注意，否则这方面的任何行动都没有意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对安全理事会非常坚定、果断、正确地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安全理事会就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讨论和拟订决议，表示欢迎。 反对这项决定的人再一次受到惨败，也显示出他们的孤立。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最近就巴勒斯坦问题和犹太复国主义所通过的决定，使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国际威信进一步提高，并加深了以色列的孤立。 三十年来的经验清楚地指出，中东的和平不能够只建筑在个别国家或甚至个别的国家集团间的休战之上。

同样明显的是，即使个别国家之间建立了和平的关系，并且停止了战争状况，但是没有考虑到冲突的所有的直接有关各方，没有解决所有的各方面问题，那么中东就不会有公正、永久的和平。

而且，该地区危机的整个历史，相当清楚地说明，如果仅仅处理问题的片面或个别方面，特别是单独来分别处理，而忽略其他关键问题，就不但没有，也不能够促进中东持久和平的建立。 如果我们要彻底结束集聚了许多重要复杂的政治问题的危险、爆炸性的中东局势，那么必须解决整套问题，但不能只为某些方面的利益，也不能损害了其他方面的利益。

在中东建立持久、公正和平的积极而正确的方式，无疑的是要充份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并使其适用于冲突的所有当事各方——因此适用于一切有关的方面。

为了使情况改善，我们应当消除最危险的紧张因素。关于这一点，安全理事会也必须作出积极的贡献。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包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应当有助于在有关中东解决的主要问题达成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尽量利用安理会在此时提供的机会，安理会是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在中东存在着冲突情况这个事实，以及冲突的性质，使我们完全有必要整体地来考虑解决的问题。完全明显的是，这些执行联合国有关中东的各项决议的要求，可充分地由已经设立的国际机构，即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来满足，迅速恢复这个会议的有效工作，是现实所必需的。

苏联呼吁，在日内瓦会议上根本、全面地解决和平解决的根本问题；同时坚信，如果没有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充分参加，想要解决中东问题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代表之参加日内瓦会议工作的问题。直接涉及解决中东问题的实质。任何人如果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以平等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工作，他就是等于反对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

各理事国都知道，苏联坚持在恢复日内瓦会议工作的开始，就应当由所有直接有关的当事各方参加——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参加——这个组织是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以色列、以及苏联和美国担任联合主席。只有依靠所有直接有关各方的联合、集体的努力，中东才能够脱离随时可以爆发的长期危机状态。这种爆发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参加讨论中东解决的各方面，不仅是按照大会的惯例也是按照安理会的惯例而产生的。苏联代表团将借此机会在这次会议上欢迎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他们为了争取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苏联去年十一月十九日给美国政府的电文，获得了世界舆论的广大支持，苏联采取主动，建议担任日内瓦会议联合主席的美国和苏联，应当邀请所有有关各方以成员资格参加恢复会议的工作。这一步骤的目的，在于推进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上一向推行的主要政策。象以前一样，我们赞成在中东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



我们赞成为达成解决获得真正的进展。 侵略者不可能凭借任何小恩小惠作为它侵略的代价。 我相信以色列领导人也不抱任何希望，以为做一点让步并将其军队从一部分占领领土上撤出，再强制在侵略战争中遭受牺牲的阿拉伯国家签订单独的双边协定，就可以使人们忘记阿拉伯人民的合法要求。 因此，目前的工作是要就参加会议的成员和重开会议的目的，适当地做好筹备和重开日内瓦会议的工作。 苏联对于恢复会议工作的问题，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并准备与其他有关各方一道，尽必要的努力，以便对一切与建立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直接有关的问题，寻求根本的解决。

目前该地区的情况，迫切地需要真正地关心中东人民获得和平、关心在将来他们不会再遭新的惨剧、痛苦或使他们再受害的人，展开进一步的努力。

阿拉伯国家曾经表明他们愿意在合理而公正的基础上取得解决。 他们已经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立场已经得到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尊重和大力支持。 我们有权期望，另一方面以及其徒从，如果决心促成和平并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友好和睦的关系，应表现出必要的现实主义精神。 中东地区和平的展望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非常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安全理事会就中东问题采取的决定。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真正持久解决的机会是存在的。 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些机会。 如果我们都真心地希望在中东促成公正的和平解决，我们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苏联政府在最近一月九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 中东目前的局势，迫切地需要所有真地希望该地区人民在明日得到和平与信心的人，进一步地加强努力。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利用目前有利的情况，解议在中东持续这么久的具有非常爆炸性的、危险的冲突，那么历史是不会宽恕我们的。

苏联准备尽一切力量，在安全理事会及其他地方，促进中东政治全盘解决的尽早达成。 这是苏联在原则上已经采取的立场。 苏联政府在我刚才提到的一月九日的声明中，再一次详细地并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项声明已经作为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文号为S/11928和A/31/43。我想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及所有其他参加安理会这些会议的人，都有机会读到苏联政府的中东声明。

主席：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请沙特阿拉伯代表按照惯例和《宪章》及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决定，参加讨论。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在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的座位就座。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在开始讨论议题之前，请容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不列颠政府和人民对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吊唁。我国首相在前几天说过，周恩来总理是现代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一位卓越的国际政治家，受到广泛的尊敬，由于他对促进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所作出的贡献——或许应该说明是无人可与伦比的贡献，他将特别受到英国人民的怀念。因而，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感伤痛之情。

也请容我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为我在十二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说了客气话——实在是包涵的话。这些话的确很使我感激。

这次辩论，是安理会一九七三年以来对于整个中东问题的第一次辩论，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有机会给予谈判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有责任确实做到，我们在这里的行动，不致损害我们正要协助的过程。

在过去三十年里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所有主要问题中，中东问题确实是由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付出了最大的心力。我们只要想想多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特别是目前联合国紧急部队以及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所作出的贡献，就可以明白了。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两次战争以后所作的决定，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最后，安理会在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中，表明经由谈判实现中东问题的解决的各项原则，并且规定了如何举行谈判以谋求解决的办法。因而，安理会过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宪章》所赋予安理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使我们在今天获得一种能影响中东事件发展的特殊能力。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责任因而更大了，我们应该确保积极地运用这种影响力，以有助于解决问题。

安理会也责成中东地区冲突的当事各方，参与这种寻求和平的努力。因此，当事各方没有在今天全部到场，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我国政府了解以色列政府决

定不参加这次辩论的原因，我们还是为它的决定感到遗憾。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内最具权威的机构，它负有维持和平的责任。到目前为止在谋求解决中东问题方面所获得的进展，总是在安理会所认可的谈判进程中予以实现的。谁也不能说，安理会不是讨论中东问题的适当场所。

但是联合国的关注和介入还没有带来和平，这次辩论也是在中东问题的一个困难和微妙的时刻举行的。经过二十七年不断的对峙和紧张——经过四次重大的战争，这个地区问题的解决，仍然遥遥无期。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极力贬抑过去几年来所取得的进展。以色列——埃及之间和以色列——叙利亚之间的脱离接触协定，以及埃及和以色列去年九月所订的进一步协定，都是这一冲突当事各方逐渐改变态度的征象。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过低估计促成这种演变的工具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够停在那里：如果不想引起发生新战争的危险的话，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而且要很快做。

如果使我们感到乐观的证据还很少，那么，我们也得同样地否定大灾难的不可避免性。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安全理事会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采取一种鼓励重新进行严肃谈判的途径。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新办法，而是一种新气氛。但是，如果我们要想促成这种谈判气氛的话，就应该避免采取一些单方面行动，使举行成功的谈判所必需的信任气氛，更加难于建立。

英国对应该据以解决中东问题的各项考虑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问题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经由谈判而不是经由战争予以解决。其解决应以三项主要的必要条件为基础。首先，以色列必须撤出它侵占的领土；其次，要尊重并承认中东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的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这些是载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并经第338(1973)号决议规定有效的基本原则。这两项决议形成普遍被接受的解决基础，

我国政府反对任何予以更改或减损的单方面企图。但是有一个第三必要条件不曾在第242(1967)号决议中表明，即也应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表现其民族认同的权利。我认为，在该项决议通过以后的八年来，各国日益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必须是任何解决办法的必要部分。

因此，我在一九七四年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中说过，英国认为：

“我所说的各项决议，必须用以下一项认识加以补充——但不是取而代之，也不是扭曲原决议：即必须承认，这些决议所规定的政府间解决，目前必须加以扩大，使巴勒斯坦人民也能参加。”（A/PV.2292，英文本第31页）

当然，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中东问题的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中，必须找出一种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申张政治权利并使他们能表现民族认同的途径。我们认为，如何进一步界定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当事各方之间从事谈判的问题。但是所采取的途径必须符合使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所有国家在安全、公认的边界线内生存的权利。这是须要加以承认和调和的两个事实。

因而，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怎样才最能使谈判解决获得新动力。首先，我们必须找出当事各方之间日益扩大的间隙。其次，我们必须强调，固定和不能变通的态度，无论当事各方在采取这种态度时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只会减少朝向和平解决的机会。当问题显得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事，肯定是寻求共同的立场，而不是坚持互不相容的立场。

我国政府理解其领土被外国侵占这么久的人，特别是将近二十年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所感受到的心理挫折——发言过的几位代表已经流利地说明了那种挫折感。

但我们也相信，漠视现实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以色列存在着，它存在

的原则获得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还没有认识这个事实的人——尤其是不这样认识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开始认识这个事实，并且开始考虑如何同以色列和平共处。这将要有一种安排，这种安排几乎必然地不能满足任何一方的每一项要求——没有哪一种安排能做到这样——不过这种安排将是使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并且能为建立持久和平提供基础的一种安排。

但是另一方也得要自我克制：以色列必须同意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更重要的是，为它做出些事实证明。光只表示愿意寻求解决办法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首先，我说过，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协助恢复所有有关各方应该参加的谈判。

其次，我们应该重申理事会现有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242(1967) 和 338(1973) 号决议——这些决议规定了解决中东问题必须依循的基本原则，并且确定了为所有各方承认和接受的谈判办法。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意义，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政治权益。我们相信，如果安理会准备这样做，我们就将在这次辩论中为朝向中东和平的进展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安全理事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有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才解决得了。因此，对这次辩论抱定超出我们所能适当希望去予以达成的期望，是不实际的。我们能够表示我们认为可能据以寻求解决办法的一些原则。我们不能把那种解决办法强加给直接有关的当事各方，因为只有经由当事各方之间的谈判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安全理事会不是这个争端的调解者。它做不到的。我们最多只能试图使当事各方更加接近，以便使他们能够根据我们在这里说明的一些原则，更好地解决他们之间的歧见。解决办法的基本要素已经存在：以色列撤出、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有安全的边界、在解决办法中为巴勒斯坦人的认同有所安排。现在所需要的，是所

有当事各方将这些要素付之实现的意愿、信心和办法。

主席：在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惯例以及《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科威特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布瓦雅先生（贝宁）：主席先生，你已经代表各理事国和整个国际大家庭以最流利动人的语句，为中国卓越不朽的伟人——周恩来总理的不幸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悼念，请允许我以贝宁代表团的名义悲痛地同你一道悼念。我要通过你，请中国代表团向周故总理的家人和中国政府及人民，转达贝宁政府和人民的诚挚深切的慰问。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同其他理事国一道，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处理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最关紧要的一些问题。我要感谢你对首次参加安理会工作的新的非常任理事国所说的亲切的欢迎词；我也要通过你，感谢向我们表示欢迎并祝贺我们当选的所有理事国以及为这次选举尽了力的所有理事国。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相信，由于你的机智、才识、礼貌，尤其是你在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实际经验，我们的工作将获得成功。我们将尽力而为，不辜负大会对我国的信任：把我国选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的理事国。

自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来，贝宁人民一直在为结束已经忍受了五十多年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而奋斗。我们已经发动的、目前正有效发展的不可抗逆的革命是为了使我国人民成为自豪、自由和自主的人民，并且是为了开创使每一个国民都能够享受生活的真正贝宁社会。贝宁人民这种深切的愿望，是全世界所有

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愿望。 这说明了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会充分理解勇敢的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进行英勇斗争的真正动机。

贝宁代表团要借这个机会向这个勇敢的人民的代表表示欢迎，并且确实乐于见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我们的工作——由于他们参加，安理会将获知一些新事实，这些新事实应能使安理会迈向通往解决中东危机的正义和公平之路。 一些权宜办法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它们只是用于制造和维持“不和、不战”的局面，这种办法是火药桶，其爆炸潜力可能吞没这个地区，或许席卷全世界。 目前是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发生这种后果无法估计的爆炸性局势的时候了。

贝宁代表团相信，如果安理会要想发挥有效的作用，所有理事国都必须坚持寻求解决危机所必需有的政治意志。 因此，首先必须改正过去的一些错误，承认并接受巴勒斯坦人民的深切愿望——即由他们行使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以及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其次，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它侵占的阿拉伯领土，这是为增进该地区各国间信任气氛创设条件，并有助于完成巴勒斯坦人民的深切愿望。

第三，必须承认和确定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边界内生存和独立的权利。

贝宁代表团在结束发言以前，要严正地呼吁各大国尽力协助国际大家庭，为这个以巴勒斯坦问题为关键的使人困恼的中东危机问题，寻求一种公正、公平及持久的解决办法。 和平和国际安全依此而定。 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相信，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坚持斗争，勇敢地克服胜利征途上的一切障碍，他们的前途是可以保证的。

主席：感谢贝宁大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 按照昨天我在安理会提到的一项理解，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暂时从安理会议席上退席，以便沙特阿拉伯代表就座。

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谢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让我有机会谈一谈讨论中的项目。

我很高兴见到萨利姆·艾哈默德·萨利姆大使主持安理会的工作，因为他主持我们的讨论的确是既沉着又有分寸。巧的是，这些品质恰好反映在他的名字里。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周全的，值得赞美的，和，周全的”并且有确实的、名副其实的函义。有这样一位名实相符的人担任主席的确是个好兆头。主席，我们希望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下处理这个困扰联合国达二十八年之久的棘手问题时，将比我们所预料的更为和谐。

我得借这个机会提一提我们的朋友艾弗·理查德先生，他主持上个月的安理会会务时，处理了安理会的其它棘手问题，表现了他一贯的高度技巧和天生的说服力。联合王国任命他为代表参加我们的工作，实在是英国国会的损失，而无疑是我们的收获。

巴勒斯坦问题纠缠着我们已快三十年了，我真希望这个问题的解决开始露出一线曙光。以色列代表人虽不在这里，但我确信他正密切注视着我们会议的进行。我们相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温和表现将使赫佐格先生和他的政府听一听这个理智的声音，这对中东所有有关方面都是件好事。

由于恐惧和疑虑，以色列政府抵制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让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疑惧。

在进行分析以前，我想先谈一谈从一九二二年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的时候以来对这个问题的一点肤浅体验。当时，我们看到国际联盟决定将肥沃富饶的新月地区——即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由英、法委任统治。我们阿拉伯人以为，象已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宣布的一样，所有殖民地人民都应获得自由。我们晓得，因为老殖民主义的力量依然顽强，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回美国的时候，心情可不太痛快。就我们这个区域而言，那场战争并不是为了拯救世

界民主制度而打的，而无非是打赢了仗好分赃而已。欧洲列强打算瓜分奥托曼帝国，这个帝国后来给瓜分了。沙俄原想要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革命救了土耳其，沙俄的野心未能得逞。我说的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题外话了。

但法国和联合王国向我刚才提到的他们称之为委任统治领土的四个国家：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派了高级专员。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讲得很明白：委任统治领土应作好准备，实行自决。

巴勒斯坦当时的原居民——即非犹太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至九十三。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七、八，而且多是西班牙或葡萄牙裔的犹太人——我们自己的犹太人。那时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那些犹太人在文化、语言、习惯和传统上就是阿拉伯人。

我们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进入我国这个地区实际就是旧殖民主义的延伸，真是一大讽刺。

法国人和英国人有没有为上述各国作出准备，实行自治呢？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怕还在跟那两个受任统治国搏斗吧。我们当然反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不是所谓的同盟国跟德意志和奥地利这些中欧国家之间的倾轧，前述各领土恐怕仍然摆脱不了外国统治的枷锁吧。

这些事已是老生常谈了，我为什么还提它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犹太复国主义者或以色列人，随你高兴怎么叫，是利用宗教来达到它的政治、经济目的的。这一点，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

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怎么样了？早撇在一旁了。在那个伟大的法国——我当然是指它在自由方面的伟大成就，每个欧洲国家内都有过一帮殖民主义者的——克莱门梭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克莱门梭曾经一把抓住威尔逊的领带跟他说，“你回你的老家去吧，这场战争是我们打的”——好象美国人没参战似的——“我们要

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他随自己的意思重划了欧洲的地图。他们把中东一部分置于殖民管辖之下，他们称之为委任统治。他们骗不了谁。我们那时还年青，但也没有受骗。

那时候还没有希特勒。一九二二年，英国人碰到一个问题。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合到已故的西奥多·赫泽尔的旗下，想到巴勒斯坦来。

一九二五年，我到过巴勒斯坦一次。那时才二十岁。我曾向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官进言，这是第三次或第四次的进言了。我以泛阿拉伯主义者的态度向他说：“如果他们想来就让他们来吧。他们可以在这里做生意，让他们住下来好了”。我那时还不了解他们是利用宗教——犹太教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我以为那些犹太人怀有崇高的宗教感情。我以为他们想到这个地区来定居是因为看到犹太教在当地的盛行，我看不出那有什么不对。但我太天真了。耶路撒冷的法典说明官可不天真。他是巴勒斯坦人，名望很高。他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他对我说：“他们要的是一个国家、一面旗帜。我们迟早要走路，因为我们不能同意在欧洲人底下讨生活，不管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这话的重点在于“不管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

那是埃及的扎格卢帕夏的时代，是耶路撒冷法典说明官的时代。那是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领袖们抵抗欧洲入侵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民主而战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背景，必须反复重提这一点。英国人碰到了一个问题，要在新的犹太移民和巴勒斯坦本地居民之间进行调解。还要不要我再告诉安理会一次？在联合王国进行的调解过程下，他们不是派了两三个皇家特派团去进行调查吗？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不高兴。他们把英国兵吊死在树上——大概是象征和平的橄榄树吧，因为我们那一带，松树并不常见。他们捣毁了大卫王旅馆——那可不是阿拉伯人或阿拉伯化了的巴勒斯坦人干的。他们杀了莫因爵士。他们杀了伯纳多特。而他们还说阿拉伯人是

“恐怖主义者”。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是他们教会的。

多年以前我常对我的巴勒斯坦朋友们说：“别用同样的方法，杀死那些可能无辜的人是不人道的”。但谁能责备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他们觉得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恐怖主义达到了目的。那些巴勒斯坦人跟今天到欧洲大学去读书，能够分析局势的巴勒斯坦人不同。他们以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采用了恐怖主义才获胜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功是因为有列强的撑腰，不是因为恐怖主义。

如果人的权利被别人踩在脚下，怎么办？有什么选择？国际联盟主持过正义吗？我曾以正式观察员的身分参加过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给海尔·塞拉西作过什么事吗？天晓得。我一九三六年还是一九三七年在英国见过他。张伯伦先生派他的兄弟奥斯汀到罗马去跟墨索里尼讲，如果他不跟希特勒结盟，就可以让他在埃塞俄比亚通行无阻。谁告诉我这件事的？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夫人。我说的这件事绝非无中生有，有书为证。现在，有位学者泰勒记载过这件事，不是我脑子里制造出来的。

巴勒斯坦变成了殖民主义——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代替英国人、法国人而来的是中欧人和东欧人——且不理睬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的是这些卡扎尔人，这些人的祖先连见都没见过巴勒斯坦。他们是从亚洲北部经过里海来的，他们沿着里海边缘居住，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定居在今天的俄国南部。

我必须把这件事向我们的以色列同事反复重提，因为非反复的提不可，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说：“上帝赐给我们巴勒斯坦”的不就是埃本先生吗。于是我研究了一下巴勒斯坦原居民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巴勒斯坦人过去是犹太人；他们在拜占庭帝国时改奉基督教。巧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不是利用宗教作为动机来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始作俑者；拜占庭人也干过这种事，而他们是希腊人。

所以这些改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人要摆脱拜占庭的控制，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信异教的卡纳安奈特人和阿摩赖特人或犹太人。拜占庭人又一次利用另一种高贵的一神教作为动机来达到它的政治、经济目的，当伊斯兰教来到时，当时住在巴勒斯坦的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又改信伊斯兰教。看这够多讽刺。象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从北部来的于公元一世纪定居在里海边的异教部落，在公元八世纪时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缓和——我们又用了“缓和”这个字眼了——而改信了犹太教。要我一再重复这些事吗？而我们的朋友，或者说你们的朋友——如果他讲理的话，让我们也用“我们的朋友”称呼他吧——阿巴·埃本说：“上帝赐我巴勒斯坦”。我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反驳过他：“上帝什么时候干起房地产买卖来的？”你们英国人和法国人证明给我们看你们什么时候取得上帝的代理权的？上帝，这个令人敬畏的上帝概念是出身牛津、剑桥的人使用的。而他们竟相信了。他们研究过达尔文和进化论。亚当的肋骨变成了我们的老、老、老祖母夏娃，还有那条花言巧语的蛇，而他们竟相信这一套。那条花言巧语的蛇对夏娃说：“吃了那只苹果”。我有一天跟美国来的朋友说：“你为什么听信原教旨主义那一套？美国这里的苹果又多又香甜。在这儿吃吧。”这些话都是编出来的。

他们过去在巴勒斯坦殖民，现在还在巴勒斯坦殖民。 我们说，好吧，这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我是指欧洲犹太人，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他们也是人。 一个欧洲人是犹太人，是异教徒，是无神论者，或是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什么错，让他们有一个国家。 那时，我在成功湖，巴勒斯坦就在压力下实行分治了。 甚至那时，非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忘记了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构成人口的三分之二，即百分之六十。 为什么打仗呢？为了争取四大自由，争取自由和自决。

这就是实际情形，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忧心忡忡呢？因为他们靠紧张局势发展，如果局势松弛了，他们就无法从我们的朋友，美国，取得援助了。 我不知道美国人给了他们多少亿美元，二百亿吧？ 我不知道美国究竟给了他们多少亿美元，就算两百亿吧，这就是他们生存之道。 还有，他们利用心地善良的犹太人的感情，这些人大约捐了两百亿，顺便提一下，这些钱是可以免税的，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犹太大亨捐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想要美国人民知道这件事。 一共给了四百亿美元。 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们不打算干预美国内政，但是为什么美国，在此之前还有联合王国，为了这件事要干预我们的内政呢？ 联合王国离我们3,000公里，而美国离我们7,000公里。 这是不是权力均衡和势力范围的问题呢？ 如果西方国家把中东看成西方的势力范围，那就让它去吧，我们不在乎。 可是平地里却冒出了一个新国家。 沙俄不见了，一个大国，苏联，却代之而兴。 如果我们想到苏联离巴勒斯坦甚至不到几百里，为什么苏联不也会想到——如果有势力范围政策的话——也许有人会搞阴谋诡计来反对它，破坏它呢？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抗局面，但是，因为赫鲁晓夫上了台，我们才不再有“冷战”，他打下了缓和的基础。 我们不会单纯到不知道这件事的。 我希望苏联和美国不会火拼，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别忘了，估计错误也可能引起世界大战，领导人毕竟也是人；而且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意孤行，他们会说：“接受既成事实吧，我们在那里，受过了不少折磨。” 欧洲人有一种犯罪感；至少，他们似乎在形成一种犯罪感。 但是为什么不把欧洲的土地分给犹太

复国主义者，让他们在那里建国呢？为什么要牺牲另一国人民的利益呢？欧洲人忘记了这些人是犹太人。我们要确立一项事实，那就是这些人是欧洲人，是殖民主义者。什么道理呢？因为犹太人渗入了整个欧洲社会，势力非常大，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是银行家。美国人穿的衣服都是他们作的，到第七大道去看看。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我们高兴他们发财，但不要坑我们。

我们阿拉伯人，不光是巴勒斯坦人，对我们的朋友，美国人——我所谓的“朋友”——还有对联合王国做了些什么，冒犯了他们呢，使得他们干预我们的内政，玩弄强权政治，而所用的却不是棋盘上的棋子，而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了谁石油特权呢？苏联吗？我们给了莫美公司。我们谁打开了贸易的大门呢？讲工业，苏联当时还在发展之中。那时世界大战刚完，他们还没有能力出口。马立克大使一直在提醒我们，他们丧失了六千人的生命。因此，那时他们无货可卖，虽然现在我相信已经有一些苏联货在中东上市了。有甚么不可以呢？

我们作了什么，冒犯了我们的英美朋友？顶顶有名的戴高乐将军觉得把这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没有什道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他们竟为此破口大骂那位重振伟大法国的声威的伟人了。

无论是谁，只要不赞成他们，就被认为是反对他们，尽管正义不一定是在他们那一边。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专靠紧张情势茁壮成长。要是没有紧张情势，美国就不会给他们钱，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也不会给他们钱，这样他们就要破产了。两年之内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货币贬值几次了。除非他们和邻国贸易，他们就不可能长此生存下去。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他们所要的并不只是政治和平，他们也要经济和平。如果他们知道明理，承认巴勒斯坦人有自决的民族权利，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他们有贸易来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们是欧洲人。我们可以不计较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有所恐惧，而我必须告诉他们这一点：我们对于他们这种恐惧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假定他们明天同意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和他们的国家并肩共存，不管是加沙地带，或是西岸，或者甚至是一个双民族国家，不管是什么，虽然他们或者还想保持本身的完整，但潜意识里他们知道早晚——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学者——他们会被同化，一同化犹太特性或犹太复国主义特性也就会随之失去了。但是为什么怪罪我们呢？我们是愿意他们保持本身的特性的，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拜占庭人，十字军参加者，所有到该地区来的人都被同化了，不是由于先有这种计划，而是由于当地闪米特文化的力量，由于语言，由于风俗，由于传统。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惧所在，他们恐惧会被同化，但是除此以外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如果他们保持这种紧张状态，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可能的选择是危害世界和平，因为该地区人民的坚韧顽强是众所周知的。正如我所说过的，他们有同化力。他们能同化别人。你们知道叫阿尔及利亚人的那些非洲人，他们最初不是从西奈半岛上来的。他们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的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没有一种所谓改变别人思想的过程。阿尔及利亚人是自己变成阿拉伯人的。在阿拉伯主义里有些力量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种力量就象回教里的一些力量一样地向外传播。我们回教里从来没有传教士。中国代表们可以告诉我是不是这样。他们本国内也有信回教的中国人。当初从哈德拉茅去的阿拉伯人是商人，有些中国人喜欢有些回教商人的生活方式，于是就变成了回教徒。我们没有象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还是耶稣教——一样有传教士去



改变别人的宗教思想。现在我要告诉各位，这些是历史事实。在思想方面亦复如此。虽然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时期试过宣传工夫，但很多人之变成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俄国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好的思想。我们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要改变任何人的思想。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怕他们会被同化，怕这么一来就不会有以色列存在，但这是我们的错吗？我可以告诉我的巴勒斯坦子弟们。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好吧，就算是他们这样借助于恐怖主义吧，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做了些什么勾当呢？哈加纳又做了些什么呢？茨维·利乌米又做了些什么呢？我提过他们做过的一些暴行：德尔亚辛事件，大卫王旅馆事件。难道还要我重复背一次吗？他们是用过恐怖主义。每一个受到挫折的人都用恐怖主义。你们知道男人为什么打妻子吗？是因为受到了挫折。现在可是太太们在打男人了——打过以后就和好。挫败会使人发疯。从前有一个时期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或欧洲法律打妻子不算犯罪，但是在我们那边打别人是一定要被称为社会渣滓的。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怎样才能使那些以色列人改过自新？我们不能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同化他们，因为我们根本不想同化他们。在我们阿拉伯世界里，没有任何制度，任何信仰，不管是教会的信仰还是什么别的信仰。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潜意识里所恐惧的，但是他们的恐惧也应该怪罪到我们身上吗？到底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让我们假定紧张情势会永远继续下去，没有和平。世界能经受得了这样一种现状——或相对的现状，因为事实上没有固定的现状这种东西——或这样一种局势吗？我要断言我们不会经受得了。不要计较我是阿拉伯人。我们是经受不了的，不管是阿拉伯人也好，非洲人也好，欧洲人或亚洲人也好，不管种族或文化背景如何。所以我现在要向缺席的以色列政府说话。这些人表示和证明了——这位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愿意和平共处。有人可以说：“不，你们是恐怖主义者”。他们在叫别人为恐怖主义者之前，最好还是先洗洗自己的口舌吧。根据《古兰经》里的一首诗，开始恐怖主义的是暴君们。情势如此。巴鲁迪不会转弯抹角，旁敲侧击。我在这里是以这个情势的小学生身份说话。我们并不恨犹太人。我

是不恨我的敌人的。我为什么要恨他们？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们都是过客。今天我们在这里；明天就不见了。如果我们不是易于有这种信仰或哲学，我们就不会有先知，就不至于一定要引导我们这些传道的先知。所谓的犹太先知弥迦说过：“公正不阿，宽恕待人，恭顺地追随上帝。”我们就不会有玛丽之子耶稣诞生。当人家问他“上帝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上帝就是爱。”我们就不会有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他在古兰经开宗明义，用的不是伟大、至上、崇高的上帝这种称号，而是说：“宽恕慈祥的上帝。”

接着可就来了卡扎尔人，他们要在我们中间恢复殖民主义——“卡扎尔人”是指来自欧洲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你说这有多妙吧！这都是过时的东西了。不能再长此继续下去了。阿拉法特在这个讲坛上说过：“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会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讲和。”有人会说他除了橄榄枝以外也带了一枝枪。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不是真的带着枪，还是他的人民带着一枝象征性的枪。假定我向一个人伸出橄榄枝讲和，而比方说他却割我的手；我最少另外一只手里要有东西自卫才行。不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无论碰到什么事都要诡辩一通，我对他们不胜怜悯。

本来我希望我的好朋友莫伊尼汉教授会发言，但他今天让别人代他出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声音有扰他的清听，还是他别处有事忙得不能分身。但是我听过他的发言后还会有机会再度发言。我希望他会说点什么来促成和平的建立。因为归根结底，亲爱的美国大使，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你手里。我们都很清楚今年是大选年，但大选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总统上任了，一个总统卸任了，一个总统获得批准了，或者没有获得批准。这是你们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的问题。你们要求和平，我们要求和平，那些人也要求和平。在我们的朋友莫伊尼汉教授发言后我还会有机会发言，我希望他会象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有节制——当然，我是指他的政府。我们都喜爱美国。谁不喜爱美国人民呢？当然，我们不喜爱中央情报局，但是中央情报局并不就是美国；正象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就是苏联一样。我们不要由别人代打的战争。让我们开始坦诚相待吧。

对了，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一下，十年以前，有一个相当调皮的记者——他一定是从外面来的记者，联合国这里的记者都很好——对我说：“要是你看到阿巴·埃本在第一大道上被欺侮或挨打，你不会觉得称心快意吗？”我说：“什么？”他说：“他是你的敌人啊”。我说：“是的，在政治上他是我的敌人，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和我是一样的。只要可能，我会过去把他拉走，救出他来。”他说：“什么？”我对他说：“你是个野蛮人。难道我们没有释放过狮心王理查德吗？我们当时大可砍掉他的头的。”我说：“我们不象你们，不象你们在欧洲或东京法庭上所做的那样。”他哑口无言了。当年德国人和日本人投了降，结果倒被吊死了。你听到过比这更没有道义的事吗？我们可不是这样。我们要向以色列人保证，一旦和平建立起来，他们就不必有任何恐惧。人民，包括我们的犹太人在内，都是很宽洪大量，讲究道义的。我对欧洲人说过：“你们还是小孩子，因为如果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你们还依然是野蛮人。而你们美国，尽管我们确实很敬爱你们，你们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又这样伟大，但在文化上你们还不过是婴儿而已——只有两百来年，从一七七六年开始”。

我们有过全盛期的。我们有过一些帝国，它们灭亡了，也应该灭亡，因为那时我们被权力冲昏了头脑。 我们有过三个阿拉伯帝国，后来都灭亡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宽洪大量和讲究道义的传统。 如果赫佐格先生现在在场，我会告诉他和他的政府不要害怕。 那些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人类兄弟。 我们要求和平，我也相信以色列人民——且不去管它的政府吧——也要求和平。 苏联人民天天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恶意指责，但他们是要求和平的。 美国人民也要求和平。 不要和平的是那些该死的政客们，倒不是他们抱着什么坏意，而是由于他们仍然遵循一个陈旧过时的制度。 如果在国际事务上没有新的作法出现，人类是会灭亡的。

主席先生，我已经说过我会找另外一次机会发言，尤其是我的好朋友莫伊尼汉教授发过言以后。 如果我发觉他发言时突然顾左右而言他的话，我会和睦地对他讲讲话，绝不使用任何粗话或脏话。 我们会一块儿谈谈，和他讲理，因为我们认识到美国手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同时也不能低估了苏联。 一旦和平之钥放进门去，他们也可以推门的。 马立克先生，如果美国打开了和平之门，你们不会这样做吗？我相信苏联会把门推开一点，这样各大国之间就会协调一致，而和平也就会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稳固发展，不论当前正在交战的那些人的种族背景如何。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大使对我个人说的非常亲切慷慨的话。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